

# 我們為什麼需要巴黎聖母院

羅傑·科恩

2019年4月17日



零公里：巴黎聖母院，法國距離丈量的零點，一個民族的參照點，是起點也是終點，是法國總統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所說的「中心」。這就是為什麼當這座大教堂失火時，那麼多人——無論是否是教徒——都在流淚。他們自身的一部分，他們的坐標，正在焚毀。

法國大革命期間，巴黎聖母院在一場反對教權主義的狂熱中遭到洗劫；到了19世紀，憤怒已經冷卻，經過修復重建，它成為了舉行帝王加冕典禮、民族解放運動和總統葬禮的場所，成為了這個國家的靈魂，成為法國與其動盪歷史、君主制與共和制、宗教與世俗實現和解的地方。

幾個世紀的光陰，證明了它的普世意義。無論是在法國還是法國之外，時間讓它成為了每個人的大教堂。「我們所有人的一座記憶之礦，」在巴黎出生和長大的藝術家克萊爾·伊盧茲(Claire Illouz)說。

巴黎究竟是什麼？是美。它的恐怖之處在於看著美麗燃燒，精緻的塔尖倒在800年歷史的橫樑構成的火海裡。這是集人類之大成者，如同神聖存在般強大的表達，在黑煙中化為灰燼。

---

人類生命的喪失是可怕的，但美的毀滅也許同樣可怕。在一個充滿焦慮、醜陋、仇恨和謊言的時代，這場大火讓人感受到了不祥。「美即真理，真理即美，」約翰·濟慈(John Keats)寫道，「知道這個就夠了。」

我的巴黎朋友薩拉·克利夫蘭(Sarah Cleveland)給我寫信說：「靜得出奇，人們彷彿陷入了恍惚，看著火焰在大教堂牆內沸騰，像一口大鍋。場面莊嚴肅穆。還有絕望。如此具有紀念意義的東西竟然如此脆弱。」

文明是脆弱的。民主是脆弱的，就像那個尖頂。今天，對此視而不見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險的。當一個普世參照物化為烏有時，一個深淵就打開了。

我還記得1976年夏天，我第一次住在巴黎的時候，教堂那如今已經向天空敞開的龐大內室是涼颼颼的。當時有熱浪來襲。河流變成了涓涓細流，噴泉乾涸，商店裡的瓶裝水銷售一空。人們坐在教堂裡的長椅上發愣。有人在祈禱。孩童在玩耍。後輩與長輩，患者與智者，聚在一起。藍色的光線透過入口上方華麗的彩色玻璃窗射了進來。空氣中有石頭和燭蠟的氣息。

那神聖給我的感覺是一種包容。巴黎聖母院是一個庇護所，而在這個時代，美國總統在唾棄庇護之所，並考慮將貧困的移民丟給那些敢於自稱庇護所的城市作為懲罰。

我在青年時代第一次看到的這座昏暗大教堂，是體諒人類犯下的錯誤的，比如1789年之後的那些革命者，他們誤以為那些聖經中的國王是法國國王，於是砍掉了雕像的頭顱。光陰荏苒，我的孩子們在聖母院的耳堂裡玩耍。其中兩個出生在巴黎，這座流光溢彩的礫石之城，它的小島像一艘艘駛向橋樑的船，它的主幹道由巴黎聖母院來錨定；這座大教堂總是在塞納河的對岸，讓人安心，它的外立面跟兩座鐘樓一樣莊嚴，側面像拱扶垛和滴水獸一樣奇幻，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它都赫然聳立在眼前。

大火過後，我們的巴黎女士還在那裡，她的塔樓已經沒有了屋頂。馬克宏總統發誓要重建大教堂。[資金大量湧來](#)。這位法國總統舉止尊嚴，當這種尊嚴已從白宮消失之際，他提醒人們，尊嚴還具有令人們團結起來的力量。

馬克宏說，巴黎聖母院是「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想像」，換言之，它是一種記憶的方式，激勵著所有追求某種超越的人。視自己為一切的川普總統的貢獻是建議派遣「[洒水飛機](#)」滅火。他的建議被無視了。

也許，對一個美國人來說，就其代表國家的力量而言，最接近巴黎聖母院的東西就是由法國雕塑家創作的自由女神像。有一天，海面上籠罩著一層薄霧，帶來一種神奇的效果，自由的火炬彷彿脫離了雕像，在空中盤旋。看著眼前這一幕，我想像著把埃瑪·拉扎勒斯(Emma Lazarus)的詩為川普時代而改寫：

把你們的暴君、你們的富人，

你們企圖溜走的可恥逃稅者，

你們想偷東西的墮落敗壞者交給我，

我要給他們自由。

把那些不體面的人交給我，看一看

像我這樣敗壞有多麼容易。

在我的一生中從未感覺到法國文明如此地重要。這就是我們所擁有的。未來幾週，一旦第一波震顫過去，關於誰該對此負責、這場災難是如何發生的、涉及了哪些疏忽，將會出現醜陋的爭論。但在巴黎街頭那些沉默、虔誠、唱著聖歌的人身上，我也看到了法國人團結起來，下定決心進行重建的可能——不僅要重建大教堂，還要重建一個被黃背心運動的暴力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分裂所動搖的國家。巴黎聖母院的故事是一個堅忍和重生的故事。

這也是一個關於歐洲文明的故事。巴黎聖母院是從希特勒的手中倖存下來。如今它所呈現出的脆弱，同樣需要歐洲的團結。